

南粤英烈传

(第二辑)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南 粵 英 烈 傳

(第二輯)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
廣東省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 合編
廣 東 省 民 政 廳

廣東人民出版社

南 粤 英 烈 传

(第二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合编

广 东 省 民 政 厅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5印张 266,000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540册

书号 11111·178 定价 2.00 元

目 录

廖仲恺	1
洪剑雄	12
曹 渊	18
陈伯忠	27
毕 磊	36
赖炎光	46
余哲贞	53
王器民	62
吴振民	67
杨嗣震	75
许侠夫	83
游 曦	89
叶文龙	96
彭汉垣	102
沈 青	110
吴文兰	117
符 节	127
吴 毅	134
朱也赤	139

王大鹏	147
梁祖诒	151
钟祝君	155
颜昌颐	161
黄平民	168
钟佩璜	174
曾昭秀	182
刘光夏	188
杜式哲	193
王大来	202
俞作豫	207
古公鲁	215
张剑珍	220
许楚魂	226
林道文	234
邓演达	242
陆更夫	251
刘大刚	256
古宜权	262
彭 桂	268
李明光	274
洪灵菲	281
刘明合	289
李素娇	294

罗屏汉	300
张义恭	308
钟蛟蟠	315
冯达飞	323
蒲 风	330
林基路	336
张文彬	346
古 道	354
黄高扬	361
王业熹	367
李振亚	374
钱 兴	382
刘黑仔	393
苏 丹	400
李 卡	406
林文虎	411
 后 记	 419

廖 仲 恺



廖仲恺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挚友。

廖仲恺，字恩煦，又名夷白，广东惠阳县人。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父亲廖竹宾，是一个热

爱祖国的侨商。

廖仲恺的少年，是在美国排华风潮日益猖獗的环境下渡过的。华侨遭受欺凌和家庭的爱国教育，都给廖仲恺以影响，在他的幼小心灵里，萌发着祖国积弱，必须发奋图强的意识。

一八九三年，廖竹宾在美国病故，廖仲恺陪同患病的母亲回到家乡。先在惠阳县从儒师梁缉赓学习国学，一八九六年转到香港皇仁书院攻读。在这几年里，廖仲恺目睹祖国的落后贫困，在香港又亲眼看到中国同胞饱受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爱国思想从而进一步滋长。

一八九七年，廖仲恺和何香凝在广州结婚，他俩志同道合，都有救国救民的抱负。

二十世纪初，向西方学习以挽救中国，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形成风气。廖仲恺也受到熏陶，决心到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一九〇二年秋，廖仲恺赴日，先入日语学校补习，后入早稻田大学政治预科，最后在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读至毕业。

一九〇三年九月，廖仲恺、何香凝在东京会见了他们仰慕已久的孙中山，从此参加了民主革命的行列。后来，他们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在日本“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对同盟会的组成，“多有力焉”。为了准备投身于即将到来的反清武装起义，廖仲恺在日本参加了由革命志士组织的短期军事训练。

一九〇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廖仲恺是时因事回到广东。当他于同年九月返抵日本后，即由何香凝、黎仲实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担任了同盟会总部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干事。

同盟会成立后，宣传革命理论和在国内组织反清武装起义，成为当时最急迫的中心任务。廖仲恺积极宣传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尤其对带有“社会革命”因素的民生主义更为重视。在一九〇五年《民报》第一号上，他以“屠富”为笔名，发表了《进步与贫乏》一书的部分译文。这不仅反映出廖仲恺支持亨利·乔治的不赞同贫富悬殊的观点；而且“屠富”的笔名，也表示了他具有反对富有阶层的强烈要求。此后，他又以“渊实”笔名，在《民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史大纲》等四篇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文。廖仲恺成为最早参与了从理论上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

从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九年，廖仲恺三次奉派回国内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他担负过同法国社会党人建立联系的任务；也参加了广东“黄冈之役”的筹划；还在东北参与办理延吉归还祖国的交涉事务。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宣告了清王朝统治的终结。全国各省纷纷响应，相继成立了各省的军政府。以同盟会员为主干的广东军政府于十一月九日组成，廖仲恺从吉林返广东担任军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稍后，廖仲恺被召至南京，参加南北议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廖仲恺跟随孙中山到上海、武汉、福州等地视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下旬才返抵广州，重新担任广东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在此后一年多的期间里，廖仲恺在整理财政和税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原来十分拮据的广东财政迅速走上正轨，后来还能做到库有盈余。廖仲恺和他的同志们，力图将广东建设成为民主共和新国家的模范省份并

付出辛勤的劳动。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又领导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为了运动议员反袁，廖仲恺于一九一三年五月奉命前往北京活动。八月，“二次革命”败局已定，廖仲恺等被迫离开广东，亡命日本。

为了更有效地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廖仲恺在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二日率先加入。同年七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廖仲恺任财政部副部长，还担任了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的编撰人。廖仲恺为在国内进行讨袁斗争的中华革命军募集经费，并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华革命军提供弹械。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死去，但北京政权落入袁世凯的继承者——北洋军阀手中，他们毁弃“约法”和国会，实行军阀专政，孙中山不得不又发动“护法”运动。

一九一七年七月，廖仲恺等随孙中山从上海抵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廖仲恺担任军政府的财政部次长（署总长职），他为筹措护法经费而日夜操劳，并多次往返于日本、上海、广东。但是，护法运动还不到一年，就在西南军阀的排挤下失败了。一九一八年五月，孙中山等又一次被迫离开广东。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援闽粤军组成以后，廖仲恺为接济粤军的经费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历次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

响，使孙中山和廖仲恺等深感研究和宣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并且看到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曙光。一九一八年秋冬，廖仲恺和朱执信等按照孙中山的安排，在上海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一九一九年七、八月间，廖仲恺、朱执信等奉孙中山命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理论的阵地。

由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二〇年初，廖仲恺在《建设》和《星期评论》上，发表了《三大民权》、《革命继续的工夫》等十多篇政论，还翻译了威尔确斯的《全民政治》一书出版。在这些著述里，廖仲恺一方面大力宣传“孙文学说”，尤其着重鼓吹“社会革命”和“全民政治”，提出实现“直接民权”才能挽救中国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探索了新的历史时期革命发展的方向，朦胧地看到只有推翻一切封建军阀的统治，消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中国才能臻于富强。

要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就需要有一个革命根据地和一支强有力的武装。为此，对于当时还驻扎在福建的由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孙中山、廖仲恺等都寄予极大的期望。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和一九二〇年，廖仲恺多次赴福建漳州，帮助粤军的建设和解决粤军的财政、弹械供应等方面的困难。在朱执信、廖仲恺等的协助和推动下，粤军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克复广州。

一九二一年五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廖仲恺任财政部代部长。除了继续担负解决财政问题重任外，在协助孙中山统一两广，准备北伐等方面，廖仲恺还

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前往广西会见孙中山，就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交换意见。孙中山立即将会谈情况用电话告诉在广州的廖仲恺。马林经广州去广西是由廖仲恺接待并派人护送的，马林离桂返沪途经广州时，又会见了廖仲恺。马林的这次南方之行，使廖仲恺对苏俄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府和统一两广，目的是讨伐窃踞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但此举却遭到陈炯明反对。为了争取、教育陈炯明参加北伐，廖仲恺奔波于广州、肇庆、梧州之间，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可是陈炯明一意孤行，终于决心叛变革命，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四日，在石龙诱禁了廖仲恺，后囚于广州石井兵工厂。十六日，陈炯明所部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公开叛变。

陈炯明的叛变，给孙中山和廖仲恺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它同时又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意志。廖仲恺在被囚期间，写下了十多首诗词，以“蠹螭”、“跳梁小丑”来痛骂陈炯明，以“死生能一我何哀”、“死奚悲”来表述自己当时的心境。这些诗词，明确地表达了廖仲恺的反抗封建军阀、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历史发展表明，陈炯明的叛变，成为廖仲恺思想发展进程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廖仲恺踏上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经过何香凝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廖仲恺于八月十八日获释，随即与何香凝离粤赴沪。这时，孙中山正在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上海举行会谈，讨论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等问题。廖仲恺在上海又会见了马林，并向他表示自己完全支持马林提出而得到孙中山同意的各项主张。这次会谈由于上海租界当局的监视而不能深入下去，只好决定移往日本继续举行，由廖仲恺代表孙中山前往日本参加。

一九二二年十月初，廖仲恺、何香凝以带许崇清赴日本和廖仲恺的侄女结婚为名，抵达日本。廖仲恺的哥哥当时任北京政府的驻日代办，廖仲恺便准备在公使馆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会谈。但由于遭到日本特高课的严密监视，会谈又无法按预定计划进行。廖仲恺于十一月初回到上海。随后又被派往福建，协助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作好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在上海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举行会谈，并于结束时发表了《联合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的原则。但对于联俄、联共的有关细节，还需进一步商定。于是，廖仲恺再次作为孙中山的代表，于二月中旬前往日本热海，同越飞继续会谈。这次会谈持续了一个月，对各种问题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取得了完满的成功。

陈炯明叛变事件，同马林、越飞的会见和会谈，使廖仲恺的思想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廖仲恺对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及联俄、联共的必要性，

对工农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对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的出路。

一九二三年初，孙中山领导的讨贼军驱逐了陈炯明，收复了广州。孙中山在广州组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廖仲恺先后担任财政部长、广东省长、筹饷局总办等要职，在统一军政、财政，解决财政困难，支援孙中山东征陈炯明，稳定广州政局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九二三年十月以后，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廖仲恺被委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担负了领导改组工作的重任。在廖仲恺的主持和共产党人陈独秀、谭平山等的协助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了“宣言”、“党纲”、“章程”等多种文件草案。

十二月，廖仲恺被派往上海，就国民党改组、出席“一大”代表等问题，同北方各省的国民党支部磋商，并筹建新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廖仲恺是大会的具体领导人，由大会的准备、进程，到中央执监委人选的拟定，都是由廖仲恺提出，得到孙中山同意后确定下来的。廖仲恺还在大会上作了多次发言，他强调了“大会宣言”的重要性以及必须为其实现而奋斗；他提出收回租界的主张得到通过，并列入了国民党的对外纲领；他批驳了右派分子对联共政策的攻击、污蔑，阐明了共产党员

加入国民党的重要意义。在大会上，廖仲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接着又被推为常务委员，工人部长，以后还兼任了农民部长。

还在代表大会进行期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建立军官学校。廖仲恺被委为筹建黄埔军校的实际负责人。经过廖仲恺多方的争取、说服、教育，蒋介石终于一九二四年五月间回到广州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在廖仲恺的努力下，黄埔军校于六月十六日开学。廖仲恺担任军校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叶剑英、聂荣臻等陆续到军校担负重要工作。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干部，成为往后东征、南征和北伐战争中的骨干力量。廖仲恺后来还担任了党军、各军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他十分注意军队的思想教育，强调要以革命思想统一全军思想，因而，对当时在广东各支武装力量的建设，廖仲恺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国民党“一大”以后，廖仲恺积极支持工农运动，把“农工阶级”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军阀的中心势力”，把“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乃决定于农民是否了解革命和参加革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廖仲恺对广东工农运动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广州工人代表会在他的主持下召开；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他的支持下创建；广东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和农会章程、工会组织条例，由他经手颁布；工团军、农团军的建立，都是由他促成的。他还亲自到南海、中山等地

参加农民的集会，在广州接见工人群众和工农运动干部。广宁农民开展反抗地主的武装斗争，廖仲恺亲自派出粤军、铁甲车队、大元帅府卫士队前往支援。沙面罢工和省港大罢工，都得到廖仲恺的大力支持。他担任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解决了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还常常向罢工工人作报告。廖仲恺真正成了“工农群众的好朋友”。

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廖仲恺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二四年六月，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当局，借口有人行刺法国官员，妄图进一步侵犯我国主权，廖仲恺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捍卫了民族尊严。八月，英国买办陈廉伯，暗中偷运大批枪械入境，意图武装广州商团，发动叛乱，驱逐孙中山，组织“商人政府”。廖仲恺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从一开始就主张严厉镇压，他采取断然手段，制止罢市，通缉陈廉伯。最后，在廖仲恺等的努力下，孙中山排除一切干扰，终于将商团叛乱平定。一九二五年三月，广东革命政府东征陈炯明，廖仲恺亲临潮汕前线，大大地鼓舞了东征军的士气。同年五、六月，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阴谋叛乱，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是镇压杨、刘的斗争中的核心人物，他数度往返潮汕、广州，调动东征军回师，又发动铁路工人和海员罢工，切断叛军交通，使得杨、刘叛乱迅速被平定。

国民党“一大”以后，国民党右派破坏“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活动日益猖獗，廖仲恺同他们进行了

针锋相对的斗争。廖仲恺坚信，苏联是“朋友”，“诚心和我们联络”；共产党“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功夫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本党一个新生命”。所以，他同鲍罗廷、李大钊以及国民党左派团结合作，多次反击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挑衅，维护了国共合作。一九二五年五月，他又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这篇著名论文，明确划分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揭露了那些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勾搭而又以老革命自居的右派分子的老底，号召人们起来同这些反革命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这篇文章给国民党右派以更沉重的打击。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廖仲恺被推为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长。稍后，又担任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他为改善财政经济状况，为黄埔军校的建设，为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更加辛勤努力地工作。

正是由于廖仲恺坚持革命立场，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向一切反革命者进行坚决斗争，因此敌人对他恨之入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遭到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所收买的凶手暗杀，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四十八岁。

（余炎光）